



刘 真 著

童年纪事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童年纪事

刘 真 著

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童 年 纪 事

刘 真 著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4.625 印张 77,000 字 印数：1—12,100 1985年4月第1版

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R10366·2 定价：0.65 元

开 场 白

作家的劳动，尤其是象我这种没有多少文化水儿的人的创作劳动，总象纤夫拉着沉重的货船在逆水而上。每写一篇，都象走着一条新航道，脚下道路的崎岖，江河的深浅，每走一步都要重新探索。不管难易，能迈步行走就算是幸运，最怕的是船儿的搁浅，怎么也推不动，拉不起了。这样，一时间，作家的艺术生命就象是完结了，终止了。我常有这种自我感觉。这不嘛，又到了这种时刻了。我把我的处境、感觉，告诉了一位同行好友，他对我说：

“你就把你的家庭，你的童年，一段一段地写出来就行了。”

我心想，你说得倒容易，这样写就不难吗？写不好就变成了唠叨，谁也不喜欢没有意义的唠叨。我呀，静下心来又一想，写，算不算唠叨我不知道，反正那是真实的，我真实的经历，有没有意义让读者去谈论吧。

说起我的求学过程，老半天说不完，因为这中间杂着许多故事。故事象大海的波涛，成串，成片，我的真正读书却成了一星半点，象小油灯，风一吹灭了，又灭了！我生气，我愤怒，这有什么用呢，那是生活，我无法改变的生活本身。

我小的时候，我们的村庄，野外，就是我们天然的幼儿园。磨棚里，老牛拉着磨转，牛就是老师，它使我懂得了粮食磨成面才能捏窝窝头当饭吃。雨下湿了土地才能播种，雨就是老师，它教我懂得，没有雨种子就不能发芽，不能长成庄稼。那时候，我们村里没有浇地的水井，只有吃水的井，洗衣服的大水坑。蜜蜂会作蜜，蜜蜂就是老师，它使我知道了枣花，野花，各种花儿的花心都能作成蜜。石榴树开了大红花，红花落了就留下个小石榴，石榴花就是老师，它不开花谁也吃不上石榴。我们的老师是 很多，很多的，有人，有物，有会喘气的，有不喘气的。在收割过的土地上，贫苦的奶奶们捡谷穗，捡麦穗，捏豆粒，她们也是我的老师，我也去捡谷穗，捡麦穗，捏豆粒。我小，我比她们多出许多功课，逮蚂蚱，捉小虫，摘野花，找蘑菇，多着呢，这一切都是我的玩具，我的学问，我的乐趣。在所有的老师中，我娘是我最离不开的，最常见的老师。她到地里摘棉花，我也去摘。她作饭抱一大抱柴禾，我抱一小抱。她作大衣服，我缝小裤小袄。她有 大包

袱，我有手巴掌大的小包袱。她给外祖父和外祖母去上坟，坐下哭，我也坐下哭，她有泪，我有口水，我把口水抹在脸蛋上，也象她那眼泪一样。

我们那小村庄里没有学校，五里外的邻村有一所县立高小，也有初小。我大哥和二哥都在那里读过书，毕了业的。我没有见过他们的课本，和本上的图画，因为他们上学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。到了我该上学的时候，我家的大人压根就没有说过也该送我到邻村去读书，我们村从来就没有女孩读书的。当邻村的女学生们放了假的时候，常从我姥姥家门前的河堤上路过回家。冬天我望着人家的长袍，夏天我望着人家那齐脚脖的大褂，悄悄地、一声不出地在人家身后跟着，跟着，一走老远，看个没够。为什么呢？我太羡慕人家了。我们村的大姑娘们，都包着小脚，使劲才裹呢，生怕两只脚长大了小不下去了。官家派邻村学校里那些大女学生出来查，叫查放脚，查出包小脚的就罚钱。她们各户串，找大姑娘，我跑在她们前面，假装包了小脚在走路呢，一扭一扭的，为了叫女学生们看我一眼，查住我，逮住我，和我说几句话儿，盘问我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她们不看我，不理我，我假装了半天没有用处，我很难过。我婶子家的大香姐姐被查出来，罚了钱了，我不管婶子那脸色有多么难看，我很眼红大香姐姐，女学生搬住她的脚，脱

了她的鞋，和她说了话啦，还摸了她的腿脚。

女学生们学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她们的老师又是怎么样呢？我很想知道，又无法知道，所以总觉得她们象天上飞的，我象地下跑的，永远和她们无法相比，永远赶不上她们。她们象神仙一样，在人间的上空飞翔。那赶不上，抓不住，不知道，不认识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是庄稼孩子学不到的知识，学问，文字。现在我会这样说了，那时候只觉得她们很神秘，很了不起。

我大哥在哈尔滨每次来信都说，叫我和我的侄女们读书。读书，不许包小脚。脚，我们没有包，读书，读书……，大概把我父亲说烦了，说动了心。他叫我嫂子打扫了东房的一间耳屋，放进两张桌子，两条长板凳。我，我的大侄女小凤，二侄女小喜，本族的一个侄女小荣，坐在里边读书，算是一间学校。我二哥是老师，不知他从哪里找来的课本，教我们念起来：“雄鸡叫，天亮了，雌鸡叫，它生蛋了，鸡肉和鸡蛋都是很好吃的东西。”这就是第一课，我们大声念着，觉得自己也是洋学生了，尽管还不会飞，也要长出来小翅膀了。我二哥很不象个老师的样子，象个丢蛋鸡，跑出跑进，高兴了就教我们一课，烦了就用手指头扒翻他的两只下眼皮，露出红肉，把黑眼球藏起来，只剩白眼珠。他说他是大老虎，要吃我们，张开

老大个嘴。就这么个老师，这样个学校，我们只念了半个月的书。日本人打来了，我二哥一炮蹶子跑了，找到八路军，当游击队去了。他一走可不要紧，敌人的手枪队冲到我们家来，一个个盒子枪张着口，我迎着枪口钻出来。敌人抄了我的家，全家人死里逃生，开始了四散、流浪的生活，走一处，敌人追一处，在奔逃。奔逃中，我早把那“雄鸡叫，天亮了”，和那课本，忘到天外去了。我记住了几个字，常常在地上写，划，念，它们成了我心中特别高贵，亲爱的朋友，把一切都丢了，家没有了，它们跟随我，陪伴我。我忘不了它们，它们也忘不了我。我多么想多多地找到这样一些朋友啊！不少户家的门框上有对联，横联，屋里有中堂字画，可怜我不认识它们，它们也不认识我。在那些动荡、奔跑的日子里，在战乱中，我就是大人多余的累赘，我心里的朋友——那几个字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总觉得，那几个字装在我心里和我一同都够倒霉了。敌人那一场一场的追捕，堵截，包围，我们太危险了，一时是说不完的。好不容易党组织找到了我们，把我们一家从各处都收容到运河西清河县的抗日根据地来。大人们在鞋袜工厂做工，把我和两个侄女送进了工厂的子弟小学读书。孙老师只顾胖了，没有顾上把眼睛长大一点。她教课那么认真，讲的又明白，我很爱她。她脸很白，一头乌黑的帽缨

子短头发，我终于有了一位真正的老师。她从前也是个女学生，我也和长大了的女学生说上话了，真高兴！我们读的课本是边区政府发下来的，第一册第一课上写着：“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我爱中国。”

我又认识了一些字，我从前认识的几个字象来了新朋友，不孤单，不难过了。因为每天在学习，它们每天都欢迎新朋友加入到我记忆中它们的行列里来。没有多久，军分区宣传队的队长来学校招收小兵，说是他们一个女孩儿也没有，演出很不方便。他选上了我和我的两个侄女——玉长和淑长，还有小华。我们很愿意穿军装，当八路军，我们的大人更没有话说，抗战第一。这一年我九周岁，穿上了特制的小军装，觉得自己太美了，把那些穿长袍大褂的女学生完全忘记了。再看见那样的，觉得她们不好看了，因为她们不抗战。敌人打来了，不抗战算什么、算怎么回事呢？越看越不顺眼，越看越费劲。我呢？不光我参加了八路军，我心中的那些朋友——“字”们也和我一同参军了，不久就入了大群。指导员笑嘻嘻地每人发给我们一个油印着五百个单字的课本，对我们说：

“小鬼，先学会这五百个单字，再发给你们一千字本、两千字本，好好学习吧，还多着呢。”

他又一面翻开本本一面说：

“这上边可没有图画，学起来不会烦吧？”

我们拍起巴掌说：“你快给我们吧！”

我接在怀里，象是五百个朋友向我走来，我拥抱着他们。这一笔一划象它们的腿脚和胳膊手，我要和它们认识了，熟悉了，不会再和它们离别了，象抛弃我家乡那许多朋友一样。它们属于同志们，也是我的。三年的部队生活，三年的不断学习，到了四二年精兵简政的时候，我和侄女都被“简”下来，和我们家的大人一起，暂时寄存在老百姓的家里。这时的我，就把许多单字造成句，不断的写在我的日记本上，文字替我说着这样那样的事，和我的心情、感想。我长大了三岁，我心中的朋友也长大了，多多了。离开部队我很难过，我心中的朋友也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络。我和侄女都剃成了光头，装扮成男孩儿。没有男孩儿的衣服，没有钱买，没有布做。我和侄女都穿着我奶奶有大衣襟的蓝布褂子，又宽又大，长过膝盖，配上光秃头，男不男女不女，老不老小不小，和人家洋学生那大褂，那模样，那身条差得太远了。人家是上学读书，我们是避难。队长和指导员来看望我们，一看我们这样子，眼睛里涌满了泪，不敢看我们，急忙拔腿走了。没想到，第二天，他们送来了八块银元。队长对我的父母说：

“我们回去汇报了孩子的情况，易良品司令员一听，很不好过，叫我们送来这八块钱，给他们三人每



人做一套男孩的单衣服。”

从此，我和侄女玉长、淑长，穿上了土色的土布裤、褂，象庄稼人的男孩儿一样了，咽下泪，多么高兴啊，感谢易良品司令员！

穿着这身可体的小衣服，政府把我们送进了抗日高小。这里的课本，和宣传队的单字本大不一样，一发四本，语文、算术、地理、历史，还发给了铅笔、橡皮、写字本。别的我不觉得奇怪，唯独这“到来米法嫂拉西”，变成数字了。到（1）变成了一，来（2）变成了二，以此类推，变成“1 2 3 4 5 6 7”了。好象我认识的朋友改了名子，老朋友变成新朋友了。对这新鲜事，我忍不住笑，自言自语地问那算术上的阿拉伯数字：

“乐谱呀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我象多年没有吃过饭的孩子，把课本当成了生命。我又有了老师，同学，这可真象那些女洋学生了。可是我们抗战，念的是抗战和革命的书，里里外外都和她们不一样，我爱我们这只有小板凳，没有课桌的学校。

又是没有想到，只念了一个月，敌人来了一场大“扫荡”，孩子们各跑各的，学校散了。在奔跑的路途中，我不得不把白土布包着的一包课本、本子、铅笔，埋在一个村外的大柳树下。我象活埋了我的朋友，心痛得回头，又回头，心里边对大柳树说：“你是我的记号，

你替我看好，敌人退走了，我赶快把它们扒出来，带回学校。”真叫倒霉呀，敌人不走了，就在大柳树所在的那个村边，盖起了炮楼。白天有敌人的岗哨盯着大柳树。夜间，敌人的探照灯那一道道贼亮的光，照着路边那棵大柳树。好象是就为了不让我靠近，不让我把课本扒出来，一定叫它们烂在土里。一直到 现在，我还想把它们找到，扒出来。正象我找不回，扒不出我的童年一样，我永远也找不到它们了。在那次“扫荡”中，别说书本了，差一点连我的小命也没有了。

我和玉长刚跑进一个村，敌人就把那一片村庄包围了，上空有敌机扔炸弹，军民挤成了一大片，一时间不知该哪里冲才能冲出去。就在这当口上，忽然看见了我二哥，他把一只手伸在人群的上空，急忙高声喊叫我们的奶名：

“小凤，小九儿……”

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那只手，挤不到他身边去，那只手在人头的上空被挤远了，他还向 这里 伸着，伸着，远了，远了，淹没在人海中望不见了。我们自己逃出了那个村庄，在麦苗地里奔跑，奔跑。忽然找到了我二哥的通信员小马，他躺着，牺牲了。我二哥呢？我们抬头四处望，这是一大片敌我互相射击，拼刺刀的战场。我们又跑进一个村里，被一位老大娘拉到家去藏起来，救下了。

二

吊 死 鬼

这一年，敌人有过好几次这样的合围，“扫荡”，清乡。我们象战争风暴中从大树上打落下来的树叶，各处散乱着随风飞转，奔跑。从宣传队精简下来的，无家可归的孩子们，一个一个，谁也不知道谁的下落。偶而和谁碰到一起，才知道这个小战友还活着，还瞪着眼睛喘气呢。面面相觑，各有说不尽的悲愁，孤单和寂寞。真够人受了。我和玉长穿着那身土色的小衣服，和庄稼孩子一起，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眼睛。各村，各处的学校，象小苗苗，被冰雹似的“扫荡”打没有了，大地上鼓起了许多炮楼。我们的大同志，很快地学会了在敌人的鼻子下面秘密地开展工作。我们一家老小，好象被巨大的旋风卷出了一百多里，从运河边的清河、武城县，跑过了枣南，来到了冀县的沙窝村庄，能活着聚在一起多么难呀！我二哥还留在武城，不知下落。

有一天，我二哥走了一百多里的夜路，上午赶到了这里。一进门，望着一炕老小，笑眯了眼睛说：

“嘿嘿、嘿嘿，都在这里，都怪有办法，都活着跑出来了。”

我和玉长刚穿好衣服，我高声喊着：“二哥，二哥！”玉长抢先跳下地，抱住了他的双手，深怕让这双手再远去了，失掉了。我想起了文文静静的小马，坐在炕沿上抹起泪来。二哥说：

“我没有抓住你们，以为你们死了。我和小马冲出村去，一面打一面退，他掩护我，我掩护他，他没有冲出来。过后我找到了他，把他抬回家去埋了。”

我奶奶坐在炕头上，撩起衣襟来擦泪。我二哥望了望一家人，坐在奶奶的身边说：

“河西岸这会儿又好了，能站住脚了，我和齐县长给小凤和小九儿找到了学校，来接她们去读书。”

奶奶一拍巴掌急忙说：

“罢哟！不念书也能长大。刚刚活巴巴地逃出来，我不许她们再离开大人。”

我二哥也急忙说：

“都回去，都住在那一片村庄去，常常能见到她们，这就放心了吧？”

好！放心，放心，孩子又能读书了，我母亲很高兴。可就是在这里，县城里的敌人偏偏地把我们想起

来了，真倒霉，好奇怪呀！

这里离武城县城八里路，叫小陈庄，有一所民办的小学校。敌人占领着县城，这里原来是接敌区，也叫游击区，敌人在根据地盖了许多炮楼，这里倒变成平安无事的地方了。村子里有个两面都应付，都纳粮的政权，实际上是我们的。这村庄就在运河西岸。这是一九四三年运河开冻的时候。

我和玉长终于坐在了课桌前，象大海激浪中的小船靠在了岸边，多么平静，甜美哟。我这才有心思看一看绿草的发芽，草芽好象对我说：“你这就好了吧？”桃花对我笑，我望不够桃花那粉红色的花瓣，花苞。鸟儿对我唱歌，河里开冻流下来的冰块为它们伴奏，哗哗响。一个女同学唱出了这样几句歌，我们一听就会了：

春天来到了，春天真美好，
花儿开鸟儿叫，小河流水哗哗笑，
我们上学了，上学了，
一二三四，上学校，上学校。

我和小华一面唱，一面跳着我们宣传队的跑腿舞。玉长比我大两岁，她身子胖点儿，笨点儿，不爱跳，在后边嚷着：

“唱就唱呗，跳起来象什么样子，等等我。”

小华拉着我停下步说：

“你看她，象咱们的老大娘，没有好饭吃，还胖乎乎的。”

小华是齐县长的女儿，我们宣传队的小战友。她先来到这学校，我们后到的，一见我和玉长，高兴得疯了，拉住我们跳了几跳说：“你们也没有死呀？这一下又好了。别看咱陈老师不革命，他拥护抗战，人家可有学问呢！老早以前毕业的大学生，在家没事干，憋闷得受不了，教起小学来，咱算有福气的吧？”她压低了声音又说：“人家是个老国民党员，有点看不起你二哥，一见面就辩论。你不要生气，他能好好地教我们功课就行了。对吧？是吧？唉？”

我们的陈老师，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，四十多岁，细高条儿，黄黄的脸，象个病人。他从来不爱笑，也不说闲话，很有点儿吓人，倒不象阎王爷，象阎王的叔叔。他教的课文，是他自己从床头上的古书中选出来的，有《陋室铭》、《木兰词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，一大串儿呢。当他念起：“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……”的时候，每句的尾声很长，嗓门又高又宏亮，象唱歌，这又不象病人了。他把每字每句都讲解得很认真，很清楚，他象掏出心来在教学生，渐渐地我不觉得他可怕了，觉得这是一位很难得的老师。有一次在我的作文纸页的旁边，他用红字一连写上了“好！好！好！”三个字，我又觉得他可亲可爱了。和我二哥教我